

# 宋代人是如何防止纸币造伪

北宋纸币铜版拓片



宋代纸币自出现以来,就伴随着作伪问题。宋初四川交子在私人发行时,伪造现象即已存在,史称“亦有诈伪者,兴行词讼不少”。以后随着交子官方发行,作伪并不因政府介入而停止,反而日渐严重。仁宗庆历年间,交子的伪造使政府“以伪造犯法者多,欲废不用”。南宋初期,仍然是“诈伪多有,狱讼益繁”。南宋东南会子的伪造问题,尤以孝宗、宁宗、理宗三朝为最严重。

据史料所载,当时纸币作伪的手段主要有三种,这就是“伪造新会、揩改旧会、盗卖会底”。所谓“伪造新会”,大致就是作伪者按会子的版式重新描摹雕刻印刷,然后把伪造的会子投入使用。“揩改旧会”可能是将旧币涂改界数或面额,而再投入流通的作伪方法。“盗卖会底”则是印刷纸币的官吏利用职权,将会底(尚未加盖官印正式发行的会子)卖给他人,买得会底者自行雕刻官印加盖其上,然后投入流通。

提高纸币质量,加大伪造困难。宋廷针对当时纸币作伪比较严重的局面,主要从防范与严惩两方面入手进行治理,其具体措施有以下3点。

提高纸币的质量,使作伪者难以仿造并加大作伪的成本。《宋史》卷181《食货下三》载,宋理宗时期,纸币作伪猖獗,伪币大量出现。淳祐三年(1243年),一位臣僚对纸币防伪提出了比较重要的4点思想。第一,防伪的上策是提高纸币质量,下策是制定法律严禁作伪。第二,人们作伪的动机主要是利益驱动,一边是获利5倍的诱惑,一边是被官府捕获惩罚的几率很低,这种情况下,人们就会敢于铤而走险。第三,伪币增多的一个主要条件是纸币质量下降,作伪者易于伪造。第四,提高纸币的质量主要应从纸料、雕刻、印刷等诸方面加以改进,使作伪者难以仿造。而且纸币质量提高,使民间作伪成本太高,无利可图,就会停止伪造。

综观史籍,这些思路几乎是提高纸币质量防伪经验的一个总结。如在纸料方面,南宋绍兴年间,“当时(东南)会纸取于徽、池,续造于成都,又造于临安”。徽州、池州、成都、临安都是当时质量上乘纸的产地,可见当时朝廷重视印制纸币中纸料的选用。又在纸币的雕版方面,四川交子发行之初,就有了技术上防伪的措施:“印文用屋木人物,铺户押字,各自隐密题号,朱墨间错,以为私记。”今天看来,这虽然很粗糙简单,但就当时的印刷技术而言,还是能起一定防伪作用的。后来,随着雕版技术的进步,纸币防伪技术大大

提高。据元代费著《楮币谱》记载,宋徽宗时的钱引每引用印6颗,分3种颜色。整个钱引的顺序是:最上面写届分,接着依顺序是年号、贴头、数字花纹印、青面花纹印、红团故事印、年限花纹印、背印(分1贯和500文),最后书写额数。可想而知,这么精美复杂的雕版以及套色印刷技术,民间一般要仿制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。

加强纸币制造发行过程的管理。熙宁元年(1068年),监官戴蒙“请置抄纸院,以革伪造之弊”。其目的是通过设立专门负责纸币生产的部门,将纸币经营权统一收归官营,以杜绝民间伪造纸币的币料来源。崇宁三年(1104年),置“京西北路专切管干通行交子所”时规定:“私造交子纸者,罪以徒配”,更明确地以法律条文禁止民间私造纸。总之,通过纸币官营、禁民私造,是切断原料来源来防范伪造纸币的有力措施。

宋代交子务设立之初,仅设主管监官1人,大观元年(1107年)五月,“改交子务为钱引务……所用之纸,初自置场,以交子务官兼领,后虑其有弊,以他官董其事”。这里显然是为了防止官吏作弊,运用管理中不相容职务的原则,通过分设纸币印制官员和纸币制造官员,使他们互相牵制监督,以避免一人兼管而很可能导致作伪的弊端。

宋代纸币管理中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分界发行。当旧币发行流通期限满后,必须兑换新币,这时官吏必须严格鉴别旧币的真伪。南宋规定:当会子换界时,要设内外两场官吏鉴定。纸币分界发行是防范作伪的一个重要管理环节,并能限制纸币的发行量。如南宋袁甫所谈纸币发行“四戒”中有“两戒”与分界有关。他认为:纸币发行“一曰戒新旧三界并用”“四曰戒新会不立界限”。

严惩造伪者,奖赏陈告者。宋仁宗时期,知益州薛田、转运使张若谷上奏欲官办四川交子时,就定下针对伪造的奖惩罚条:“若民间伪造,许人陈告,支小钱五百贯,犯人决讫,配铜钱界。”神宗熙宁初年规定,伪造交子的处罚等同于伪写官文书印者,处以流放2000里的惩罚。徽宗崇宁三年(1104年),朝廷扩大对涉及伪造纸币行为处罚的范围,除伪造者本人外,知情不报者、转用伪币者等均得受罚。到南宋时,将伪造犯人处斩已成定例,支赐陈告者的奖赏也增加了。

宋廷为使严禁伪造纸币之令家喻户晓,还将禁伪赏罚文字刊印于纸币票面。如北宋徽宗崇宁年间发行的小钞票面上有“上段印准伪造钞,已成流三千里,已行用者处斩”等文字。至于南宋会子,其票面样式,上半部分不但印有会子名称及面额,更以56字详示禁伪赏罚教文:“敕伪造会子犯人处斩,赏钱壹仟贯。如不愿支赏,与补进义校尉,若徒中及窝藏之家,能自告首,特与免罪,亦支上件赏钱,或愿补前项各目者听。”从宋代历朝对纸币作伪者及其相关人的处理上看:一方面,其处罚逐步由轻变重,惩治的范围也逐渐变宽。另一方面,对于陈告者的奖赏由少至多,从500贯提高至1000贯。统治者立法思想是通过严惩重赏,一方面威慑作伪者,加大其犯罪成本,使其不敢以身试法;另一方面加大对知情者、负有督察责任官员等的赏罚力度,提高纸币作伪案的发现概率。提高纸币作伪的发现概率,比加大对纸币作伪的打击力度,对作伪者更具威慑力。还有宋代将禁伪赏罚文字刊于纸币票面,这是一种最广泛的普法活动,并对妄图作伪者时时敲起警钟。

宋代有关严禁纸币作伪的立法比较严密,并具有较强的针对性。但是,在具体执行中难免存在着偏差。“今伪造有禁,刊之印文,编之教令,非不严具”,但“前后犯禁之人,未必尽论如法”。更有甚者,吏治腐败也影响了对纸币作伪的执法。伪造会子“一有败露,纳贿求免”“法当重戮,仅从未减。似此姑息,何以戢奸?”正由于执法不严,有法不依,致使“伪造(会子)者所在有之,及其败获,又未尝正治其诛,故(会子)行用愈轻”。(方宝璋)

## 古人的读书观

古代社会,教育条件比较简陋,教师比较短缺,读书学习门槛较高。然而古人非常喜欢读书学习,他们在很早的时候就认识到读书学习的重要性,而且在学习、工作、生活中不断检验这种重要性。

### 修身立德

通过读书,可以正心、育德,更好地从事自己的事业,更好地为社会和国家作贡献。傅玄说:“立德之本,莫尚乎正心。”读书可以为“正心”提供涵养源。明朝末年有一个叫杨维岳的人,“生而孝顺,好读书”,这对他养成正确的道德观有着很大的影响,“毅然自守以正”。他在读书中,将古人的道德仁心铭记于心,读到感触之深之处,流泪以敬之,“尝读书,至忠孝大节,往往三复流涕”。他对文天祥的自爱、有节、忠诚的人格非常景仰,“画像祀之”。等到崇祯自缢,杨维岳南下,下令剃发,“维岳不肯”。周围的人们劝他暂避风头、妥协退让,杨维岳以“吾死耳”而答之。他的儿子走到他跟前哭泣,他下定决心以死殉国:“小子,吾平生读书何事?一旦苟全幸生,吾义不为。吾今得死所矣!小子何泣焉?”随后,他“不食七日”“顷之遂卒”。如果不读书或者读书力度不够,就不可能有如此之决心,正心、育德之事就不可能做好。

道光时期的名臣陶澍在给好友周石芳的回信中,告诫他要让子女多读书:“尊府深仁厚德,积累自不待言。惟于读书一事,悠悠忽忽,毫不介意,大有倚恃名父坐享富贵之意。不知名门世家之子,京师中落寞何限?一旦失势,欲如常人而不可得。世俗炎凉,大抵如斯。求其可久,惟有精进之一法。”出身名门世家,更应该读书正心养德,如若沾染不良习气,一旦政治气候突变,没有好的品德和才华作支撑,很快会上衰微之路。

### 解决难题

《围炉夜话》中说:“士既多读书,必求读书而有用。”这里的“有用”是指通过读书能够解决实际难题。《呻吟语》中说:“学识一分不到,便有一分遮障,譬之掘河分隔,一界土不通,便是一段流不去,须是冲开,要一点碍不得。”有了更多的“学识”,才能更好地“冲开”障碍。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提倡经世致用之学,他所提倡的“通儒之学”就是面向社会、实践和现实的:“综贯百家,上下千载,详考其得失之故,而断之于心,笔之于书。其术足以匡世,其言足以救世,是谓通儒之学。”陶澍则将读书解决实际难题概括为“实学”:“有实学,斯有实行,斯有实用;非是,则五石之瓠,非不枵然大也,其中乃一无所有。”陶澍这段话意在强调学以致用、解决实际难题的重要性。

明成祖时期,有一个官员叫周忱,于永乐二年(1404年)中进士,后“进学文渊阁”,阅读大量皇家藏书,不断累积自己的知识和学问。周忱被任命为刑部主事,“浮沉郎署二十年,人无无知者”。人生前期的知识沉淀和阅历积累,为其后来才华的施展奠定了基础。明宣宗时期,江南财税没有得到系统梳理,缺一个能吏进行管理。当时大学士杨荣推荐周忱,“迂忱工部右侍郎,巡抚江南诸府,总督税粮”。等到周忱去了江南之后,从实践中了解到许多豪族“不肯加耗”,许多贫困群众逃亡这些重要的事实。他把读书积累的知识和经验运用到解决江南“税额益缺”问题中,处理得游刃有余。周忱创设制度,“令出耗必均”;分解调配粮长权力,将屯粮、验粮、收粮程序设计得更加科学合理;整合财政、交通等部门资源,确保国家对江南税赋收取顺利进行。任职期间的周忱政绩卓著:“终忱在任,江南数大郡,小民不知凶荒,两税未尝逾负,忱之力也。”

### 以学资政

古代有才华的思想家在经历复杂人世之后,静下心来读书,收获颇丰。南宋思想家陈亮从狱中出来后,“归家读书,所学益博”。陈亮钻研典籍,穷极义理之说,“以积学为工”“以涵养为正”,学问人生名于一时。陈亮的才华得到皇帝赏识,“御笔擢第一”,被授予官职。比较可惜的是,陈亮还没有大展宏图就去世了,但其学术文章留了下来。西汉名臣黄霸因事被关进监狱,在狱中,秉持“朝闻道,夕死可矣”的理念,向经学专家夏侯胜学习《尚书》,体现了他不畏困难、坚持学习的精神。在狱中,黄霸学习积淀,为日后出狱成为干练循吏奠定了扎实基础。

### 开拓眼界

古人求学读书,有一类是为了开拓自己眼界。许多有作为有眼光的官员亦喜欢与博闻多才的人交往,目的亦是为了开拓眼界,充实人生的价值与意义。宋朝的林逋,是当时有名的诗人,其志向不仅在于仕宦,而且在于通过自身学识的增长来实现人生理想。青少年时期的林逋致力于学,他能避免章句之学,做学问追求达到古人提倡的恬淡高雅的境界,虽然“家贫衣食不足”,仍然能够守于学业、安于贫困。后来,他定居西湖孤山,专心务学,写出许多诗文传世。宋真宗闻其名,“赐粟帛”“诏长史岁时劳问”。杭州知州“每造其庐,清谈终日而去”,羡慕其学问文章,与其探讨切磋,充实人生体验、开拓自身眼界,令人称羨。有了学问文章,品人论世自然有其独到之处。林逋游临江时,见到刚中进士但是“未有知者”的李谔时,当即论李谔:“此公辅器也”。后来,李谔果为国之重臣。其品人之准可见一斑。林逋去世时,宋仁宗“嗟悼”“赐谥和靖先生”。(石志刚)

